



CHINA NEWS DIGEST — CHINESE MAGAZINE (CND—CM)

• — • — •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(CND) 主办 • — • — •

—— 增刊 第八三八期 ——  
(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报出)

本期目录 (zk1203a)

【亡灵祭坛】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白介夫  
【口述历史】 红墙边的反革命 (下) 王宇等 · 卜伟华 · 米鹤都

小启：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参观。

文革博物馆》网址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

欲订阅本刊《文革博物馆通讯》请致函 [cnd-info@cnd.org](mailto:cnd-info@cnd.org) 获取订阅资讯。

来稿请投寄 [tougao@cnd.org](mailto:tougao@cnd.org)。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。

## 【亡灵祭坛】

###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

• 白介夫 •

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，好多事情渐渐淡忘。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，却是越久远越清晰。我想告诉人们，告诉下一代，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，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——萧光琰。

#### ◇ “外行”领导“内行”

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我刚好从师范毕业，便跑到西安，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，又能挣钱，又能抗日。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，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，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。这个偶然选择，决定了我的一生。

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，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，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，没有怀疑过毛主席。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。1957年，在一片“外行”要领导“内行”的呼声中，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（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，简称“大化所”）任党委书记，同时兼副所长。这对我来讲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

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，我近乎文盲。“我行吗？”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，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又无所畏惧的年龄，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。

我没有专业知识，但是有常识。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，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。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，主管科研，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，从心里尊重他，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，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，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。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，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。

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。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，怎样寻找新的燃料？由于一些“外行”在场，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，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“外行们”的理解水平。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不舒服，试图改变。

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？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，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，什么是无机化学。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。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，也真是“大炮打蚊子”了。他用最通俗的语言，为我扫化学盲。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，而碳，氢，氧这三个基本元素，既可以组成糖、面粉、木头，也可以形成油。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。

我学得越认真、吃力，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，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。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，却让我常常想到，一个人能忘我地、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，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、想不到的真理，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，而且需要献身精神。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，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，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，很希望尽己所能，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。

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，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。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，萧光琰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年龄相仿，经历完全不同。

#### ◇ 萧光琰的过去

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，后移居美国，读完大学，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。

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，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。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，所以越是压制，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。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，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，动员你留下。

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，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，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。萧光琰参与此工作，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，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。建国初期，中国政府广招人才。成立了“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”，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。“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”。这种形势下，很多中国留学生，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。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。

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。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，甄素

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。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，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。

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。甄素辉说：我连中文也不会讲，回中国干什么呢？现在是共产党当政，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，谁欢迎我们回去？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，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，就是贡献。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，生活能否习惯，各种爱好如何满足，他没有细想。决心已定，谁也改变不了。

萧光琰说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，我就自己回去。有人说“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，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”。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。甄素辉让步了。

1950年12月，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，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，回到了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的祖国。

来到天安门广场，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，毛主席万岁，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。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，各持各的观点，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，全民一致，努力表达对共产党，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。对贫穷，对落后，他还有些思想准备，而这种政治气氛，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，有些隔膜，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。

他被分配到石油部（那时叫燃料部）。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，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，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。萧光琰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，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（现在的“大化所”）。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，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，他甚感欣慰。

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，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。

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，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，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。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，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、绘画、体育活动，岂不太枯燥了！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，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，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，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，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。

作为一个技术人员，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，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。他曾对我说：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，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，房子、汽车随之而来，如果失业，马上会一无所有。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，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。

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，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，钼要比铂便宜，不用进口。从最终效果看，铂虽然贵，但催化效率高，收率高。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，采用了铂重整技术。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，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，也很成功，到六十年代，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，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“五朵金花”的新技术之一。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，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。

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，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，主要是针对“美国文化帝国主义”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批判他们崇美、恐美的思想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，很有声望。为了夺取政权，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，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

优秀的知识分子。夺取政权以后，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，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。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、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，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，就忽视党的领导。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，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文学家站出来“脱裤子割尾巴”，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。对这一点，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，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，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。

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

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，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。运动初期，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，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。运动深入以后，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。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“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，为什么选择回中国？”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，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。

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，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，血气方刚，没有韧性。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，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，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，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，气得把眼镜都摔了，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，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。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，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，可是没有。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、对毛主席的热爱。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。遇到不合理的事，要据理力争，不能沉默。他要向上面讲清楚，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，凡事都要求“有个说法”。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，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。

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，不想明确回答，也无法明确回答。运动是他们领导的，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，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。

得不到“说法”，萧光琰无法忍受。在美国，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。换工作不容易，于是他就自行“罢工”。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，在家闹情绪。那时候，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，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，心理上又有些敬畏。所以也没人管他，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。

回国时他充满幻想，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。刚刚三十多岁，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。在这种气氛下，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？甄素辉能受得了吗？他变得忧心忡忡，焦躁不安，彻夜难眠。后来的运动中，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，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。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，得到的竟然是怀疑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，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。常常书放在那里，看不进去。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，就说：萧先生这样下去，可能会自杀。他有科研能力，但现实不要他出力；他有头脑，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。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、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。

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，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，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，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。为了安静下来，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。他情绪的波动，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。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，不管萧光琰怎样，她都理解。这对夫妻，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。

运动过去，生活恢复了平静。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。本来就没什么朋友，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，实验室里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。

运动过去以后，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，使他受伤害不小，向他表示歉意。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。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，马上不计前嫌，重振情绪，又开始努力工作。不久，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，女儿出生了，给她起名叫萧洛莲，小名就叫洛洛。

1956年初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，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。萧光琰感到很矛盾，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，但仍然热爱那里。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，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，更适合他，就决定留在大连。在美国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，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，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，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。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“我是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安，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，放到厕所里不悲观。”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，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。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，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，个人主义。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，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自己有选择的权利。

几经周折，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。

#### ◇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

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，比较有人情味，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。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，他没有瞧不起，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，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，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。

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，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。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。萧光琰酷爱打网球，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，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。他说你一定会上瘾，我可以教你。我那时年轻，活跃，这既是消遣娱乐，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受他感染，我也爱上了网球。网球场上龙腾虎跃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伪饰造作，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，只有输赢。出一身汗，头脑特别清楚。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，离萧光琰家非常近，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。网球这个媒介，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。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不以利害相交，无拘无束，热爱生活。

#### ◇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

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”这篇文章，大鸣大放开始了。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。

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，言行越来越谨慎。但是当他读了毛主席的文章，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，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，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，没按毛主席说的办，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。

忽然间形势大变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工人阶级说话了》。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（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）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，频频向市委报捷，今天抓出几个右派，明天抓出几个右派，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。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，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，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，怎么会是右派呢？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，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。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，自己就要成右派了。无奈之中，我召集党委会，讨论抓右派的问题。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经过几次

常委会讨论，就决定了右派名单，有研究员彭绍逸等，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，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。以后在形势允许时，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，诚恳地向他们道歉。

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，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。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，以一儆百。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

#### ◇ 大跃进开始了

到处都是“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”的口号。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。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，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，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，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。

萧光琰来我家，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：炼铁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？要有专业知识，要有预算，要建厂，炼钢的温度很高，要有特殊设备，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？还说：有一天回家，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，进了家门问保姆，门闩怎么没有了？保姆说，来了一群学生，要找铁锅、铁铲子去炼铁，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，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。

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，他累了一天，想放松一下，刚要躺下，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：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”。他说：这是枕头啊，是让人休息睡觉的，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，那人也太紧张了！能不失眠吗？我听了也乐了，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，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，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。

很快，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。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，现在开始用一年、三个月、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。于是接二连三地出“成果”，一有“成果”就敲锣打鼓，连夜到党委报喜。不过以我“外行”的水平，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“科研成果”，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，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。多年“革命经验”告诉我，要维护党的政策，不能打击群众热情，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。

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，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。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：“白先生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。”

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：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？这简直是儿戏嘛，什么叫成果？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？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？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，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，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。

反右运动以后，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，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。有人是真不懂科学，有人懂，却不敢讲反面意见。每场运动，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，推波助澜。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，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，为什么要消灭麻雀，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，接上自来水，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。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，想过什么，行为如何，是否忠于共产党。每个人的政治待遇，工作中的升迁，都赖于这种评价，于是千人一腔，万人一面，趋炎附势成为潮流。

在中国生长的人，顺应潮流比较容易，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！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。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。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，到大连石油七厂，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，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，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。

## ◇ 与众不同

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，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，头发吹得一丝不乱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英气焕发。这使他与众不同。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，工作时高效严谨，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，必须劳逸结合。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，躲到哪里待一会儿，暗自偷点儿懒，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，饮茶休息时间。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，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。可当时的中国，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，让很多人看不惯。

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。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，家里招待客人，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、巧克力。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，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，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，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。这些事一经传开，群众中再加以渲染、夸张，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

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。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，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，是测试工作。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，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。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，有时非常幽默。在那个火药味很浓，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，他常常被人误解。

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，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：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，一是温度，二是压力。都是用开水蒸馒头，可能温度没问题，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。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：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，控制好压力，馒头肯定能蒸好。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，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。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。

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，为了新鲜，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。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，常常睡得很晚，又经常失眠。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，很懊恼，就开玩笑说，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，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。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，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，可话一传出来，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。

萧光琰喜欢跳舞。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“老干部”太土了，就不仅教我打网球，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。他说：你应该好好学跳舞，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，又可以活动身体。我那时很活跃，他一提到学跳舞，我也感兴趣。那时到周末，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、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，那里可以看电影，可以打乒乓球，跳舞，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。

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，每次到了舞厅，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，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。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，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，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。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里跳舞已经很风行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。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。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就说：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，没关系，她可以教你，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。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。

萧光琰还说：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，或者拥抱她。现在见多了，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，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，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。

他的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，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，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。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。

他曾说：有人做反应，连温度都不记录，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，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。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，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！失败了，找不出原因，成功了，重复不了，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？

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，有明确的误差范围。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，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，萧光琰马上发现，并立即指出，不讲情面。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，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

他和我说，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，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，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。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“清规戒律”，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。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，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。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，有些紧张，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。中国人讲情面，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。

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，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。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。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，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，但多已过时，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，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，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。图书馆的人很高兴，就说你把书拿来吧，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。这完全是客气话，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，当时有“中国特色”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，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。可他径直说：你们看着办吧，象征性地给点就行。美国书非常贵，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。

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，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。人们可以更经常、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，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，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。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。

1958年，萧光琰所在的“催化过程研究室”要迁到兰州，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。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“哪里艰苦哪安家”，而是“哪里科研条件好，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，哪安家”，他要求留在大连。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。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，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。

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，被社会认同。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，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、敏锐，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、木讷。萧光琰属于后者。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，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。搞政治越中庸越好，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，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，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。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。

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。有人回忆：“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，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。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，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，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，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？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，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。”可以想象，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。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，社会和大众越宽容，越有包容性，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，包括科学家。

#### ◇ 再受伤害

反右斗争、大跃进之后，新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。叫“拔白旗，插红旗”。



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，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，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，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，因为他无法改变的“资产阶级”生活习惯。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。

大字报铺天盖地：批判他学阀作风，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，主奴关系，要求苛刻，经常训斥助理人员；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，爱跳舞，喜欢音乐，醉心于贵族运动——网球。有的大字报写：你拿着高额工资，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，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、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。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，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，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，甚至说他是奸商。

萧光琰气坏了，他找到我说：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，不是等价，更不是盈利，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，怎么就成了奸商？在美国好朋友之间，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，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……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？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？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，运到中国，送到图书馆，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，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，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。再说，当时我也没说收钱，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，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？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。要给我钱，我同意了，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？于情于理都不通啊。

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，只能劝慰他想开些。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，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。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，按当时党的教育，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。

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。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，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，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，把他说过的一些话，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。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。他忍无可忍地说：我这样的人，如果人格被伤了，改造就慢了。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。

#### ◇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

虽然各种运动不停，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，两家仍然经常来往。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，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。他和我讲他的委屈，有时甚至流下眼泪。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，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。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，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。

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。他有一个和睦家庭。他自己爱好广泛，对夫人非常体贴。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气质高雅，文静宽厚。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，一头卷发，聪明天真，又极有教养。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，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。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，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。

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，可是她从不抱怨，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。在我家里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，他夫人从来不插嘴，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，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（不太流利的中文），从不多说。她非常爱丈夫，坦然地接受着现实。回国十年了，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，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，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。

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当天气骤然变冷时，她会变出一件毛衣，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，把毛衣穿上。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。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。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，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，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，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，帮夫人穿上。有西方“妇女先行”的君子风度。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，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“屋里的”那种命令式。我看到这些，觉得很新鲜，也很欣赏。

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，做游戏。洛洛很争气，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，正值盛开之际，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。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，要给她照相。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，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？洛洛有自己的主意，坐在花的旁边，眼睛看着花，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，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。前几天，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，无意中，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，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。洛洛举着小手，乐呵呵地招呼人。

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，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，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。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，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。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，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，寄托在孩子身上。接触过他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，是一个好父亲。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，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，还图什么呢？

#### ◇ 两极对话

我和萧光琰的经历、背景完全不同，很多观点也不同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。其实这些不同，开阔了我的眼界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。

他常说：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，只会工作，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，也是人生的遗憾。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，而是人生的完美。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、爱跳舞大惑不解，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，工作有什么意义呢？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？

那个年代，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、入党，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，争着做收拾卫生、打热水之类的事，群众的反映不错。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，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。

我对他说：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，你得入乡随俗，随大流，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，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，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。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，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。要有点儿遇水则柔，遇铁则钢的韧性。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，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，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，帮助清理卫生，和工人打成一片。他会很奇怪地问：为什么？

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，为了试验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，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，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。他说那是工作需要，我可以做。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，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去干工人的活，那不是浪费吗？人是有分工的。

虽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照顾，可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有责任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某些遗憾，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，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写信给妹妹说：“我曾经为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，但是，我相信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的规律。缺点是暂时的。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，

就是尽力帮助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。”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诚。我想他当时与我的很多谈话，是希望我这个难得的知己能冲破思想束缚，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规律。

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，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”，“冤家宜解不易结”，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。而他的很多观念，对我来讲也很生疏，很难解，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。

成年累月，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，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，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。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，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，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，可他又觉得，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，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？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，社会能发展吗？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，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，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，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，能有突破吗？

“拔白旗”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。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，改变了刚回国时，一有想不通的问题，就要打报告，要说清楚的态度。

现在想来，他经常对我诉说他现实的不解和无奈，有些是很有道理的，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作为一个基层领导，我已经习惯了和党步调一致，对他的想法，不敢做深入思考，只是想让他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，让他学会保护自己。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。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，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，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。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，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，无法改变他的命运。有些时候，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，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，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，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，潜意识当中，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。所以直到现在，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，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。

#### ◇ 我被停职反省

即使我很谨慎，也没保住自己，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。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党内被批判的对象。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，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。

大跃进运动之后，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。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，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。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，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，水平一定比我高，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，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，我担任党委副书记。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，同意了我的要求。

新书记工作努力，但正襟危坐，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。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，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，而老是来找我谈。群众对她的不满，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。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，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。

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，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，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“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”一边。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。

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。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，认为责任在她，不在我，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。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，只好把她调走。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。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，都搞不好关系。我那时还不知道，她的走，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。

1959年庐山会议，彭德怀被批判以后，党内开始了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”，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。大跃进之后，市场物品紧缺，货架上往往是空的。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，回家说：外面到处是标语，搞除四害，搞六无六净（已经不记得其定义），搞什么六无六净，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，就在党内的会上说了。

综观我对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斗争不力，妥协退让，加上“六无六净”的“右倾言论”，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。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，每天在家写检查。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，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：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。虽然心中无愧，失去工作，停职在家写检查，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。

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，无端挨整，使我对于“右派”、“白旗”被整的心态滋味，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。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！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，党的利益出发，其实政治清算背后，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，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。

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，没再去打网球，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。

#### ◇ 又见光明

当我的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报到省委以后，省里派人下来调查，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，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，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，只算是有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”。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，恢复了我的职务。这次停职反省，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。

我恢复工作以后，很珍惜工作机会，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，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。

张大煜长在中国，到德国留学四年，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。他工资很高，可十分节约。工作中他个性随和，能变通顺应，迂回解决问题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，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。张大煜勤奋刻苦，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，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，广招人才，尊重人才，知人善任。除了研究学问以外，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。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。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，张大煜功不可没，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。

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，他曾提出把“大连石油研究所”的名字改成“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”，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，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，我给与全力支持。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

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，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，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，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，真正推动科学事业；另一方面，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，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，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。

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，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。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，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。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“青岛会议”。这次会上，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。在科学领域里，很多重大

发现都出自年轻人。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（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），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，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。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。

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。所里进行了“解疙瘩”等拨乱反正的活动，对反右派，拔白旗，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，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。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，当然包括萧光琰，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。萧光琰很兴奋。

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。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，心情十分愉快。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，用水果、点心和糖款待他们，和他们谈工作，谈学习。

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，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。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，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，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。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，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。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，有时是有意识的，有时则是无意识的。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，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，试着融入这个社会。

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，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。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，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，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，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，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。这个想法，使他很激动。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，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，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，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。

最近几十年，新的生物催化剂——各种酶——不断被发现，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，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，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，等等。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，相当有预见性。

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，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，他努力工作，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。1964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“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”的课题攻关任务，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。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。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，他当了室主任。

那时他曾经找到我，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，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，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？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（他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）。我当时听了，很感动。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，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，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，太天真了。

1964年末，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。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，此后，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，只是从到北京开会、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。

#### ◇ 文化大革命开始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，走向极点。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每天挨斗。

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。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，给我挂个大牌子，我们手里还拿着盆，拿着棍，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。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，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。回家后夫人、孩子像迎接“英雄凯旋”一样，准备了好饭好菜，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，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，“今天我被游街了，给我挂个大牌子，写着‘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’，不过我一看，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‘打倒钢杆保皇派×××’，心里想，还有比我硬的呢！”全家大笑起来。

另一次斗争会上，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。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，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。两边有两个大耳朵，斗他时一按他的头，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，我看着觉得很可笑，虽然在挨斗，心情并不坏。这时候，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，年纪比我还大，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。那时有很多人这样的人。

人有群胆没有孤胆。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，心里不太紧张。在挨斗时，周围很多人，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。一次斗争会上，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。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，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：“别让他跪着，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。”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。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，他出身好，什么也不怕，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不久，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，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。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，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（科学院的副秘书长）。我曾参加抗日，有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，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，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，如果我被开除，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。我长期做人的工作，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，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，不很激烈，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。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，即使这样，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，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。

我被关在专政队时，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？我常常想到萧光琰，很为他担心。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，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，他性情急躁，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，透明，坚硬，很容易破碎。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，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？他们挺得住吗？

我被放出来不久，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。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，却久久地，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。

## ◇ 走向深渊

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，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，他生活的最后片断，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，成了被打倒的对象。他家也像我家一样，挤进其他几家人。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、厕所。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，是太不习惯了，突然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。

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，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，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。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，只能喝口水，吃几块饼干。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，谁也不敢理他们，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。

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帽子，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、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

分量了。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，只要你出身好，或暂时属于“革命群众”，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，去给别人扣帽子。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。

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，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。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，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，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。至于其它问题，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，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，在中国不适用，因此得罪了一些人。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争，哪里有能力去反党。

文革开始时，萧光琰还能承受。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。洛洛生在中国，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，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“黑五类，红五类”，她当然属于“黑五类”，压力很大。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，

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，互相支持，盼望情况起变化。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他们全家都挺住了。可形势愈加恶化。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。萧光琰意识到，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。

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，大家都叫他“八角帽”，是大连电磁厂的工人。态度很凶狠，动辄就动手打人。1968年10月5日，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“牛棚”，与其他？鬼蛇神集中在一起。同时，抄了萧光琰的家。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，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（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）。

在中国这个环境中，萧光琰特殊的经历，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，突然进了专政队，离开了夫人，离开了女儿，他感到失去了一切。前面一片黑暗。

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，不管有没有根据。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，能抓出美国特务，在当时多荣耀啊。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、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。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。当时所谓？打击一小撮，保护一大片。”其实是“打击一小撮，吓倒一大片。”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，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。

“八角帽”的功劳越来越大。在他眼里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怎么“教育”都不过分，他们没有什么功劳，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。他们用当地人发“博士”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“白屎”。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，为了扩大战果，有人开始动武，特别是“八角帽”，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。每天拳打脚踢，甚至用“三角带”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。严厉的、无休止的“审讯”周而复始：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，生活那么好，为什么回到中国？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，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，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？

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，写揭发材料，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，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。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。

四顾无援，遍体鳞伤的他，在经历了世道人心，生死荣辱之后，心如死灰。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，五年，十年还在怀疑，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，还在怀疑。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、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。

1968年12月6日，工宣队的“八角帽”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。他精神特别坏，喃喃自语：“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……”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，寻找过生

存下去的理由。可是，他看不到出路。他不想连累家人，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，更不想对不起孩子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，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。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，要么不留遗嘱，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，为的是不牵连家人。

12月11日晨，当专政队员喝令“牛鬼蛇神”起床时，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，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。验尸结果：服过量安眠药——巴比妥自杀。他走了，带着满身的伤痕。他刚刚四十八岁。

这是“八角帽”没有想到的，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。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。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，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，防止再有“畏罪自杀”的。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。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。工宣队的人贴出了“特大喜讯”晓喻全科学院，决定“乘胜前进，深挖一切阶级敌人”。

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。由大连化学物理所，大连海运学院，大连运输公司、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，并命名编号，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（三〇一）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，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，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，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，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。当然，他们说这是“清队的重大收获”，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”。但可惜的是，任你怎样政策攻心，棍棒启口，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。所以，“三〇一”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，以至不了了之。可恶的是，“专政队”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。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，不久，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，作为“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”的活样板，把他们的‘经验’赫然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#### ◇ 九泉相会

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，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。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。严肃地宣布：“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，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。你要继续交待。”

甄素辉异常安静。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。她看着丈夫的遗体，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：准许她请两天假，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，她的请求被批准。她当天就回家了。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，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，无人照料。

甄素辉天性柔弱，却善解人意，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，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。她外圆内方，有自己生活的原则，做人的原则。萧光琰多次挨批判，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。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，没留下一句话。出于母亲的本能，甄素辉不能不想，如果她随萧光琰走，洛洛怎么办？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，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，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，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。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，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：永久的纪念。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。

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，一起吃了饺子。几天后，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，母女俩紧紧地相拥，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，无法忘却的可爱、弱小与无辜！刚刚十六岁，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。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？唯一的解



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！

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，而且亲自过问，追究责任。当年毒打萧光琰的“八角帽”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。

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，但我可以说，我自己，我周围的很多人，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，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、我们国家、和对我们的信任。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，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？历尽凄风苦雨之后，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，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#### ◇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

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，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，他要求和我见面。我当时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见我呢？萧光琰去世时，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。我的印象中，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，但看上去挺年轻。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，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。见到他，我除了寒暄，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。

萧光灏话还没开始，已是老泪纵横。

他说他很后悔，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，来中国也可以，到香港见面也可以，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，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，一直没回来。总以为都还年轻，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。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。每当想到这里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，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。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。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美国也有报道，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，可已经无法联系，现在来了，可是太晚了！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。

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，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，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，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、妹妹生活过的环境，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，他们工作过的地方，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；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，也表示一点谢意。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，除了家庭之外，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。

不是指责，不是声讨和愤怒，而是感谢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作为一个基层领导，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。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。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。我很想说“对不起”。

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，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，刚刚在走上坡路，还心有余悸。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，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。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，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，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。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，对他来讲，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。后来调查，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，最后也没有找到。

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，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，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。我已经八十多岁，一直坚持打网球，挥拍之间，我常常想到萧光琰，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，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。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。这样一个和睦的家，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，是我们民族的不幸。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，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，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。每一层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有一份责任。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，我希望他能知道，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，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

的毅然选择，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，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。

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。我期盼“萧光琰”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。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，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，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，也行而不远。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，增强其包容性，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。

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，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。

注：我年事已高，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，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。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、准确的情况，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。文章大概成稿后，让女儿去大连，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，他们是陈庆道、李文钊、刘宗海、陈怡萱。另外关力、刘秋荣、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长、北京市政协第六届、第七届主席）

□ 摘自《亲历记：走向1949》 吴思编著 出版社：山西人民出版社

~~~~~

## 【口述历史】

### 红墙边的反革命（下）

• 王宇 • 侯瑛 • 李红旗口述，卜伟华 • 米鹤都采写、编辑

（续 z k 2 0 1 2 c）

#### ◇ 和军训团较劲

其实，我们学校军训团一进学校，就表示支持“八一八红卫兵”。但实际上，他们还是比较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。而且当他有了倾向性以后，还斗了一部分学生。比如初二的一个女生，当时她还不是我们“八一八红卫兵”的，后来才加入。她只是说了一句：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。然后她们班同学揪斗她，军训团也斗她，斗了一回不行还要继续斗。

她就找我来了，我觉得不对，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。我说，一个初二的小姑娘，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。而且她这句话其实并不错误，马列原著里是有这句话的，她只是说的不准确。军训团说那不行。我就急了。我说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是我告诉她的，你能怎么样？为斗这个女生的事，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。我说，从今天起，28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，我就让你下不了台！当时斗了好几个人呢，侯瑛好像也挨斗了。

另外，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，别让他们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，干这一类的事。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，但是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，暗地支持他们，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。

我还经常让军训团下不来台。大概是1967年，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，分了两部分。我们当时组织的是去海淀苏家屯劳动，军训团组织的是到大兴去劳动。我们这部分去了1200人，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。当地农民对我们也特别的满意。我们给他们割稻子，什么都不麻烦他们，做饭都是我们自理。军训团组织的不到200人，结果还淹死了一个人。他们挺没面子。1967年底学校又到大兴去劳动，这次我们跟军训团是一

块去的。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。军训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，做野味。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，逮刺猬的事都不要弄，咱们是来锻炼的，就好好劳动。结果，他这人一边吃还一边喝起酒来了，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。我说，就你长得这么胖，还吃呢？打仗的时候你跑得动吗？你走都走不动！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，可能吃好的吃惯了。

军训团先是成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——文革筹委会，让我当副主任，我最后给推了，让我们“八一八”的另一个同学当了副主任。在28中准备成立革委会时，我与军训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。在干部人选上，我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。一个是教导主任XX，一个是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。

军训团说何XX历史有问题，其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，我们都调查过，就是他14岁当儿童团长的时候，国民党军队来了，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，他说国民党好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就说他是叛徒，我们认为他是革命干部。

李红旗插话：这些调查材料，包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，我们都看过。当时大致情况是：国民党军队来了，就哄儿童团，给他们拿了好多糖吃，问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？小孩想吃糖吧，就说国民党好。就这么一句话。这个材料不知道是怎么整出来的，可靠性也难说。我们认为这不说明什么问题，而他们认为这就是叛徒。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，一直闹到负责西城区军训的郭副司令员那里，他是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，他都出面了。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，结果他就不听。双方斗争特别激烈，简直就没法开会。

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书记，“文革”后当了西城区区长。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，被枪毙了。他自己的历史其实是很清白的。在教导主任和书记的问题上，我们和军训团的结论完全相反。

#### ◇ 五一节的武斗

王宇：4月底，我们得到消息说，汪东兴要谢富治抓我们“八一八红卫兵”的人，罪名是反军训。我就不断地去找军训团长闹，要求给个说法。据说后来军训团长把泄露这个消息的汪XX给训了一顿，还说要通过北京卫戍区告诉他爸爸。这使得汪XX很恼火，于是就怪罪于侯瑛，因为是侯瑛从他们那里听来后告诉我的。

“五一”那天下午，汪XX带着几个人，找到侯瑛，把他打了一顿。侯瑛在反抗中掏出一把小刀，把汪的手划了一个口子，还有一个在抢刀子时手也被刺破。这样，他们就从后院找了好多老红卫兵和红旗的人，到我们“八一八红卫兵”的总部来。当时我正好在总部，旁边也就有一两个女生。他们不由分说，上来就打，用棒子打在我的头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

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就赶紧组织人马。通知附近与我们有关系的各校“四三派”组织，请求支援。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。到天快黑的时候，六中“红旗”的、三十一中“东方红”的，还有许多学校的“四三派”组织都来了，人数很多，就把28中给包围住了。后来把我们学校的“老兵”、“红旗”打得很惨，打伤了不少人，有几个人伤得挺重。最后是军训团出面，让老兵、“红旗”那些人撤退。我当时也怕出事，就放他们走了。

侯瑛插话：其实那个事就是跟汪东兴有关系，如果没关系打不起来。我那会儿跟红旗那几个小哥们经常来往，他们原来也是王宇的哥们，后来跟我都不错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一消息，他说汪东兴把我们军训团杨团长叫到中南海里去了一趟，团长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准备抓王宇。汪东兴的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旗的人，他们听说后就捅给

我了，我告诉了王宇。王宇就天天去跟杨团长闹，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，他拿王宇一点辙都没有。那时王宇还是我们筹委会副主任，主任是杨团长。但是正的老搬不动这副的，特别窝火。

这之后，杨团长把汪 XX 叫过去臭训一顿，说要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他爸爸。结果呢，汪 XX 就特恼火，在五一那天，就找了几个人，把我打了一顿，骂我为什么说这事。当时他们人多，我就从兜里掏出把刀子来，抵挡了一下，就把他们的人划伤了，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。后来他们就叫来了一帮人，到我们八一八总部，就把王宇打了。王宇被打之后呢，当时就火冒三丈，就赶紧组织人马，打电话通知好多地方。天蒙蒙黑的时候，那时候各学校都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五一节嘛，都打着各个组织的旗子去了。

那天王宇晚上在那个广播站一说，好多中学生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。我们就通过广播，大概召集来了有一两千人吧，就把 28 中团团围住了。老兵和红旗那帮人，白天就撤到房顶上了，结果后来就走不了了，被围上了。我们学校那个教室啊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，他们站在一个耳房上，后来的声援这帮人啊，好多人都爬到到高墙上去，从高处往矮房上打，那瓦片像雨点似的，最后打的稀拉哗啦的，老兵和红旗那帮人全从那个房上滚下来了，后来就收不住了，当时王宇就怕打出事了。黑天，尤其三十一中那几个人拿着练刺杀的木枪，往死里打。最后，军训团都出面掩护老兵和红旗那些人撤退了。那天有几个人受伤挺重，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。

王宇：武斗以后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来过我们学校，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，他说，王宇来了没有？我就过去了。他说，你站到我旁边。他说话别人听不懂，要让人翻译。那是我头回听他讲话。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武斗，我当时跟他急了，吵起来了。实际上，陈伯达是倾向我们的。

#### ◇ 关于“四三思潮”

侯瑛插话：1967 年戚本禹“四四”讲话否定了《出身论》，不久，遇罗克就被抓起来了。原来大家在《出身论》问题上还有争论，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，就等于彻底否定了。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。不过，我们没有批。与此同时，和《出身论》密切的那帮人特别活泛，好像印了一个报，叫《四三战报》，然后到处去卖，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。四四派后来就纠集一帮人去砸那个报，闹得挺激烈的。

1967 年 6 月，《四三战报》发表了一篇《论新思潮》〔5〕，湖南的杨曦光也写了《中国向何处去》，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些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。从情绪上来说，大家都叫好，好像是替“四三派”在说话。但“四三派”的多数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，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，跟《中学文革报》的观点有点儿雷同。

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，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，一般都不参与。我个人的看法，这种说法，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。良乡电校“八一八”和建校“飞虎队”，都是“四三派”中最激进的。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？是不是能够说，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？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。历史上有所谓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“皇帝轮流做，今天到我家”，用一种口号向旧的掌权者叫板，但“四三派”你代表得了新生力量吗？“新思潮”在理论上比较幼稚。我就反对说什么“我们四三派是最革命的”，你怎么就能说你是最革命的呢？我们王宇大哥就从来不说我们是最革命的，而只是说我们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等等。包括湖南那位写《中国向何处去》的，你凭什么写《中国向何处去》啊？

毛泽东搞文革，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，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有时候我也想，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，到了那种气候下，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有一个启蒙的作用，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。1949年解放的时候，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，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，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，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，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，不受外国人欺负了。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。

李红旗插话：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，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。所谓“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”观点，那不就是说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就是最革命的了。我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，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。

1959—1962年的大饥荒，各地饿死很多人。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，但我们生活好一点，没有这种感受。我觉得，文化大革命当中，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，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，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，搞民众的文化革命，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。但我们在北京，生活好一点，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。湖南的“湘江风雷”、石家庄的“狂人公社”，我到东北串连看到的，他们的所谓造反，很残暴。我东北有一个表哥，谈起文化革命来，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，我说怎么能这样呢？！我始终认为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。

#### ◇ 一年零四个月的“反革命”

王宇：1967年底，在抓我之前，我们已经预感到了。我们托了很多关系，向黄作珍（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）、刘绍文（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）等打听情况。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在造反派组织中抓坏头头的消息了，还有江苏。北京电报大楼的“红电”、“红迅”也抓了一些人。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。从各处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头。28中的地理位置太突出了，树大招风。另外，“四三派”也有点太招摇了。看看那些小报，全国各地出什么事都有“四三派”的影子。我觉得“四三派”的力量相对比较弱，因为你是中学生嘛！却又事事出头，非招嫉不可。我们当时考虑，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。可是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。

1968年1月19号那天早晨，我刚走到学校门口，天上飘起雪花来了。我说，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，今天八成要出事！等到抓我的时候，那个雪就停了。

军训团来了好几个人，说找我有事商量，进到屋子里，他们几个扑上来就动手捉住我。把我摁倒以后，直接把我搬到操场的台上，就斗争了。当时说是开全校大会，但参加开会的也就百十人。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。先斗了我一个人，我被押走以后，又斗争了侯瑛和教导主任。

我们学校在南海的围墙底下，有个很小的院子，一排小平房，我就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偏房里，只能放下一张床，差不多也就6平米。由学校里的学生，每天24小时看守着。把我押着从教室后边拐过去，到这个小院子的路上，我看见旁边南海的围墙上边都已架上了枪。我还听说，怀柔的警卫师都出动了，卫戍区要做好准备，因为消息传说当天有好几千人要来冲28中救我。这显然就威胁到南海的安全了。

我被抓以后，开始一直顶着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。后来，关押我的人告诉我：你还得意什么？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！她在一个什么大会上说的，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？28中就有一个人，王宇就是反革命嘛！我一听不像是假的，再顶也没用了，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。当时他们说我有十条罪状，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。说王宇猖狂地说，毛主席怎么怎么样，

猖狂地、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。类似这些罪状多极了。有人揭发，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说的。再一反问，他们也说不上来。后来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，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？一个人一个人地问，我说，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。后来这些诬陷我的话，最后一句也没有落实下来。

那时期他们每天斗我，总共斗了有300多次。有时候一天就斗三、四次，排着队地斗。这个班斗完，转进那个班，一直搞到中午。开斗争会都要把我的两个胳膊搬起来，直到现在，我的俩胳膊还有点毛病呢。

后来，学校就搞清理阶级队伍了，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师，都关在我旁边。还有一个姓王的工人，也是我们这一派的，是“反革命”。还抓了老红卫兵的几个人，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。当时抓的人挺多的，关了一大排。这里面的人经常被打得哇哇乱叫。没挨打的就我一个。他们说，要保护好典型。

到“五一”的时候，学校的喇叭里广播，到处贴标语，什么“红色电波传喜讯，中南海畔春烂漫”。据说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28中军训团打电话，问：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？这消息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，我说后来怎么说的啊？他说，说完这句话，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。结果空欢喜一场。

我们“八一八红卫兵”的同学还在全市发传单，呼吁营救我。北工大“东方红”有一次把28中整我最厉害的人抓到北工大去，揍了一顿。

我被关在学校里，长达一年零四个月。原来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，他们就拼命整我，后来虽然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，但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来，也一件没落实，所以就一直关着我。后来他们对我逼得更紧了，每天白天斗争完了，晚上提审，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。我就开始进行抗争。我的头上现在还有一个伤疤，是有一天早晨扫地时，拿一大块石头自己砸的。就是表示我拒绝扫地了。以后，我还过摸电门，也没电死。然后我就开始绝食，持续绝食了6天。

整我的时间一长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几次变化。在他们的压力下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错了，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。但是在被逼到极限以后，又反过来想，我是对的，我是正确的，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情绪又开始转化了。我想，反正是死，就斗争到底。

因为整我有功，我们军训团的团长还立了大功，得到提拔了。那年，华北三支两军会议，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，其中一个被整的典型就是我。1968年7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的下方，刊登了报道文章：《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——北京28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》。文章点了我的名，我成了反派的典型。

#### ◇ “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”

到了1969年年初的时候，他们还给我定不了罪，就让我出去。我不出去，他们干脆就不管我了。那时候，我在院里可以随便活动，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，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。

有一次，我在门卫室坐着，来了一拨儿沈阳搞外调的。他们说，你们学校的王宇呢？现在干什么呢？我说，王宇就是我。他说，你不是全国典型吗？我说是啊，是典型啊。后来宁夏垦的有个连长，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，都跟我谈了，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？我说我不去。

他们都让我去，依据的就是我那个“典型”。

长期的折磨，使我的神经受到刺激。挨完整以后，神经一直就没好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我自己都知道我的神经有毛病，思考问题经常丢三落四。以前考虑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，现在是考虑到这儿，另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。有时候说着话呢，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。

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就跟几个人到北京市委上访。里面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，是一个军人，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军衣，估计可能是海军的。我说，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就含糊糊糊的对付我。他还说了一句，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。我一听，急了。我说，操你妈！当时拿起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，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。后来被李红旗他们几个拦住了。李红旗对他说，他挨整以后神经受刺激了。那个军人说，我们理解你，理解你。

后来工宣队进校了，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。工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，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。工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，说你的罪名一项也没有核实。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，经过这个呢，你就更成熟了。他们说，你受冤枉了。这之后，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。最后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了，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。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，说你呆着也是呆着，再呆也没个日子，干脆走吧，出去转转吧！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到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。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。

后来，我托人找了汪东兴，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？因为你出动部队了。据说汪东兴的回答是：这是上头命令的，不能说。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，打完电报后几天，1969年12月底，在工体开了个什么大会。去参加大会的人回来跟我说，陈伯达在会上说：28中有个王宇，现在提什么要求，你是革命小将嘛，有功有过的，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嘛。就来了这么一句话。我觉得这好歹也算是给了我一个交代，也就算是给我平反了。

但是这个平反没有正式宣布，我还一直不服。到1970年，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。再后来，林彪的事情出来了，我就想，算了吧，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。我已经自由自在了，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，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。

1970年9月，我就去了铁道部的五七干校，在河南息县。在干校呆了将近两年，到72年7月，成立武汉铁路局，干校就把铁道部的子女800多人都安排到武汉铁路局了。分配工作时，把我分到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。第二年，我就当了副班长，后来又当了突击队的副队长。1974年底，我当了安装队队长。在那里干了6年，到1978年，把我调到襄樊铁路分局供电段，一直干到1996年底，当时有个政策，到50岁可以提前退休，我就办了退休手续回到北京了。

注释：

〔1〕1966年10月16日，有关部门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印发了统一的“标语口号”。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，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。较之16日印发的，删去了如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！”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！”等口号。“三司”认为这是“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”。18日凌晨，“三司”进行总动员，和北航“红旗”等造反派一起，上街游行抗议，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“打倒刘少奇”的口号，并召开了“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”。此事惊动了毛泽东。10月18日凌晨，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，恢复了原来的口号，并增添了“三司”提出的新口号“谁反对毛主席就

打倒谁!”

(2) 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, 军训指挥部负责人。

(3) 25 中高三学生,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组织部长, 后任中学红代会的组织部长, 四四派的骨干。

(4) 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, 主管中学工作。

(5) 《论新思潮——四三派宣言》, 发表在《四三战报》第一期, 1967 年 6 月 11 日。

---

本期编辑: 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: 《CND》总编:

华新民(美国) 思语(美国) 陈天寒(美国)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-8602

投稿专用地址: [tougao@cnd.org](mailto:tougao@cnd.org) 其它事项请电邮: [cnd-cm@cnd.org](mailto:cnd-cm@cnd.org)

如需有关《CND》和《华夏文摘》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, 获取

中文文件: [hxyz-info@cnd.org](mailto:hxyz-info@cnd.org) 英文文件: [cnd-info@cnd.org](mailto:cnd-info@cnd.org)

《华夏文摘》万维网服务站(WWW)地址: <http://www.cnd.org/>

---